

许慎与「说文」小丛书 主编 王宁 董希谦
宋永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说文解字』与

文献词

义学

许慎与「说文」小丛书 主编 王 宁 董希谦

宋永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说文解字』与

文献词义学

(豫)新登字 01 号

许慎与《说文》小丛书

主编 王宁 董希谦

《说文解字》与文献词义学

宋永培 著 责任编辑 魏亚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卫生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字数 56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215-03077-6/H·111 定价:2.70 元

序

王 宇

许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字学家。一千八百多年前，他编著的《说文解字》，在中国文字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有着长盛不衰的影响。

有人把《说文解字》称作一部字典。其实，它的意义和作用岂止是一部字典！它不仅为我们系统地贮存了经过秦代书同文规范了的小篆和一部分曾与小篆有密切关系的大篆和“古文”，贮存了经先秦经典验证过的古代文献词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上万个汉字的形体逐个地分析，证实了早期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确立了以形索义的词义分析方法；它通过独创的体例，总结出小篆构形的总体规律，描写出小篆构形的完整系统，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如络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由它所显示的小篆构形系统，由于顺应汉字的发展趋势，又由于切合汉字的实际，还因为符合汉字优化的原则，所以，强有力地影响了后代的隶书和楷书，起到了促进汉字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解释汉字的形义上一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FFM 108

一千八百多年来,《说文解字》以一部 创出了一个“学”,人们称作“说文字”或“许学”。特别是清代以来,说文学的大家辈出,巨著不绝,生发出《说文》体例学、汉字构形学、汉字形义学、汉字字用学和汉字文化学等分支,为汉字基础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比篆文更早的出土古文字丰富了汉字历史的研究和汉字字源的探讨,使人们进一步明白了《说文解字》的伟大意义,也客观地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对《说文解字》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应用也更加广泛,普及说文学知识成为更多人的要求。

许慎是河南鄢城(现属漯河市)人,河南是许慎的故乡,河南人民崇敬地称许慎为“字圣”,他们说,河南有“四圣”:字圣许慎,医圣张仲景,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这些话里,包含着河南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自豪。和世界同时期的语言文字专门著作相比,象《说文解字》这样构思严密、分析透辟、有明确理论指导又具有创新体例、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作用的字料、语料汇集,确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许慎是“字圣”不过分的。

河南人民出版社和《许慎与〈说文〉小丛书》的作者们,就是基于上述原因,出于深入浅出地介绍《说文解字》方方面面知识的愿望,把这套小丛书奉献给对汉字的使用和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以及热爱故乡、崇敬许慎的河南人民的。应当说,我

们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我们相信,读者和我们是相互理解的,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说文解字》和汉字问题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一定会越作越好,并且将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汉字规范、汉字信息处理以及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一九九一年八月

目 录

- 一、《说文解字》与先秦文献词义…………… (1)
- 二、《说文解字》与多义词的本义、引申义 …… (11)
- 三、《说文解字》对词义关系的表述…………… (27)
- 四、《说文解字》使先秦文献词义系统化…………… (50)
- 五、《说文解字》与文献词义学的发展…………… (72)

一、《说文解字》与先秦文献词义

我们中国是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这种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主要是靠文献典籍来记载的。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文献典籍,是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从远古起,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中国为止。这段时期的文献典籍,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有“五经”和“诸子”。“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诸子”指《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春秋战国时期有影响的学派的代表著作。五经、诸子的内容,总的来说是记载先秦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经历的历史事件,风俗习惯、典章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五经、诸子是凭借什么东西来表述这些内容的呢?是用先秦时期特定历史阶段的语言词义。这种表述先秦时期历史文化内容的,至今保存在五经、诸子经籍文献中的词义,我们称为先秦文献词义,简称文献词义。

先秦文献词义不是一般的历史词义,它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有众多书面材料证明的最古而又成系统的汉语

词义。汉语词义的产生同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发生同样古老。在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发生期，汉语词义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由于历史久远、史料丧失而无法作出确切的说明。我们考察古老的汉语词义主要凭借地下的出土文字和现存的古代典籍。出土的文物文字有些虽时代久远，但比较零散，语言资料不全，更谈不到成系统。而先秦文献词义却有明显的两大优点：一是它拥有众多的书面材料——主要是五经、诸子的丰富语料可资证明；一是这些词义构成体大思精的系统。如果我们以这两大优点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既有丰富的书面语料作证明，又具有严密系统性的词义，在汉语词义史上比较起来，其年代最古的，就应当推举先秦文献词义了。例如，

先秦文献中记录了“通”的早期语言词义，这种词义，是先民对草木春萌作精细观察与领悟之后作出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春雷震动、草木破土是新的一年中天地生机的开始。所以先民特意选取春日发动、草木萌生的形象特征来规定与使用“通”的词义。请看《说文》对于“屯”这个词义的解释：

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一，地也。尾曲。（一下·中部）

“屯”的本义是难，具体指称草木萌生时出土艰难的形象。其萌芽被土层压着，所以萌芽的尾部呈弯曲之状。这一意义在《周易》中是有证明的。《屯》卦说：“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序卦传》说：“屯者，物之始生也。”这是说天地交合而化生万物。

万物化生以草木萌生为代表。草木萌生是艰难的。这一意义在甲骨文中也可得到证明。甲骨文“屯”的形体正象一枚萌发的子芽（见《古文字类编》296页，中华书局1980）。萌芽之所以屯难，尾部之所以弯曲，是因为受到土层的阻塞，使得它不易冒头，因而《尔雅·释诂》说：“阻，难也。”

面对土层重压，子芽萌生的基本方式是“彻通”。《说文》云：

彻，通也。（三下·支部）

“彻”的词义是指子芽“彻除”阻塞，开辟地层上接于天的孔道（“彻”后来引申指“吃完饭后彻除酒席”，又引申指“一般的除去”）。故《说文》十四下“辰”的训释义下面徐铉说：“三月阳气成，草木生，上彻于土。”在一下“屮，草木之初生也，……读若彻”的训释义下面徐铉又说：“象草木萌芽通彻地上也。”子芽上彻于土，必须把土层打穿，这就是“穿”、“疏”、“贯”。《说文》云：

穿，通也。从牙在穴中。（七下·穴部）

字形“从牙在穴中”的“穿”，就是文献《诗·召南》“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之“穿”，古人心目中，子芽破土，与鼠牙持续有力地“穿透”墙墉是相似的。

这一穿透土层的举动，也与“刻疏”的功效相同。《说文》云：

疏，通也。（十四下·去部）

《说文段注》解释说：“疏为刻镂”，“疏，刻穿之也”。就是说，“疏”的词义是“刻镂”。必须沿着一个方向连贯着刻镂，阻塞才可能穿透。于是“通”就有了“连贯、贯穿”之义，“贯”本来包含着“穿”。《说文》云：

𠄎，穿物持之也。（七上·𠄎部）

包含“穿”义的“贯”，本字是“𠄎”。子芽把由里到外的土层一气贯穿，土层阻碍就整个儿彻除了。可见与穿彻土层相联系的，是“推弃”，由此活现出“春”深藏的原始义。《说文》云：

春，推也。从艸从日，草春时生也，屯声。（一下·艸部）

“春”的“推”义包含着“排挤摧折”，这从《说文》以下训释可以看出：

推，排也。（十二上·手部）

排，挤也。（同上）

摧，挤也。（同上）

可见，萌芽是通过拼力排挤、摧折压在头上的土层才得以出世的。上古“春”之“推”义，正是指草木萌芽推弃土层而上出。甲骨文也可证明，甲骨文“春”字，即是子芽向日挺出之形（见《古文字类编》302页，中华书局1980）。

因此，萌芽彻除土层阻塞，开辟地下与天上连通的孔道，这是“通”的形象特征。这个形象特征凝聚了“通”的核心词义——经过内部除阻，连通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个核心义把“疏、穿、𠄎、彻、推、排、摧”等意义联系在一起，构成“通”的早期词

义系统

通	{	疏(刻镂)
		穿(穿透)—贯(连贯)
		彻(彻除)—推(推弃)—排(排挤)—摧(摧折)

以上对于先秦词义“通”的分析与综合表明,一方面,“通”的词义是成系统的,又一方面,这些词义有文献语言材料可以作为证明,例如《周易》《诗经》等,此外还有《尔雅》、甲骨文等。

不仅是“通”的单个词义,其他先秦词义也都有上文提到的两大优点。所以说,对于先秦文献词义不可等闲视之,先秦文献词义在汉语词义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有众多书面材料证明的最古而又成系统的汉语词义。

先秦文献词义生动深刻地保存了中国早期语言词义记录、指称客观事物的方法与经验。我们的先民沉浸于特定的情境,采取整体连贯与具体实证的方法,通过对普遍联系的自然万象与人事百态的精心观察与领悟,把选取、加工过的客观事物的形象特征升华、积淀成为意义,贮存在词里面。

上文分析了先秦文献词义“通”蕴涵的形象特征,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通”的近义词“达”这个词义蕴涵的形象特征。

萌芽在彻除土层阻塞之后,即以其锐利的锋芒迅疾、畅利地射出地面:

《诗·周颂·载芟》:“驿驿其达。”毛传:“达,射也。”正义:“苗生达也,则射而出,故以达为射。”

“达”不仅指称萌芽出土的迅疾与畅利，也直接指称萌芽出土。这是表明它“已至”地面的结局的：

《诗·周颂·载芟》笺：“达，出地也。”《诗集传》：“达，出土也。”

“达”还包含“向上”义，因为萌芽出土是向上的。我们看到，《说文》中“达”、“出”、“上”这三个词义往往连用：

出，进也，象草木益滋上出达也。（六下·出部）

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十四下·乙部）

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六下·生部）

“达”还包含“增大”义，因为草木从萌芽到出土，到继续向上滋长，其形体日益增大。《说文》与“出”相联系的“之”，即含有“增大”义。《说文》云：

之，出也，象草过中，枝茎益大有所之。（六下·之部）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词义“达”蕴涵的形象特征是“草木迅疾畅利到达地面并向上滋长、形体增大”，简称“草木上出”。

了解与把握先秦文献词义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地去学习、研究五经、诸子等先秦文献，全面地清理这些文献中的词义及其联系。二是深入地去学习、研究《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采用整体贯通的方法把握其中贮存的词义及其系统。

经由这两条途径去了解、把握先秦文献词义都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但是比较而言，前者因为文献典籍浩繁，其中的词义多为使用义（使用义指具体人的笔下或口中使用的意义），

意义之间的关系错综纷繁,要清理这种词义及其联系需要较多的人力分工协作,用长久的时间做大量精细的工作;而后者呢,由于许慎已经对先秦文献词义作了积分整理的工作,已经按照特定的条例把这种积分整理的结果贮藏到《说文》中,这样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的研究范围相对集中,把全书的 9353 文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整体来看待,便于我们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地研究与把握先秦文献词义及其系统。

我们之所以能够经由研究《说文》的途径去把握先秦文献词义及其系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说文》是许慎对先秦文献词义的精审总结,是先秦文献词义的集大成。

许慎博学、精研五经文献,学有本源,他编著《说文》具有丰厚深湛的文献基础。《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载:许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卷,皆传于世。”(《后汉书》2588 页,中华书局 1965)许慎因通晓经典文献而享盛名,《说文》正是在他“博学经籍”、“撰为《五经异义》”的基础上写成的。

许慎著《说文》的主要目标,是整理先秦文献词义。《说文·叙》指出:“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见《说文》的目标是整理、贮存包括五经、群书、通人说、方言在内的词义。其中,由五

经、群书记载的先秦文献词义是主要的部分，其数量非常多。《说文》解释词义时往往引用经典、群书、通人的说法与方言。有的标出了所引经典、群书、通人、方言区的名称，有的则不标出这些名称。《说文》在证义时标出了书名、人名、方言区名的有 1304 个词条，其中引用西周至秦的典籍、方言的有 1182 个，占证义词条的 91%，引用《周易》《诗经》《尚书》《周礼》《左传》的有 920 个，占 70%；而引用汉代的书籍、通人说的只有 122 个，占 9%。（限于篇幅，这里不能把证明、统计的具体内容与过程表述出来）。以上说明，《说文》整理的词义材料主要来源于先秦的文献典籍与方言口语，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周易》《诗经》《尚书》等五种儒家经典。清代研究《说文》的专家做了大量精细的“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工作，现代也有人全面地做过《说文》“引经考”、“引群书考”的研究，都证明《说文》的绝大多数词义训释与“六艺群书之诂”是吻合的。所以，整理先秦的文献词义是《说文》的主要目标。

许慎整理文献词义的态度是十分精审的。对于不清楚的问题，在《说文》中就用“阙”来表示；对于无法解决的问题，则存而不论。也就是《说文·叙》指出的：“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闻疑载疑”。（《说文解字》316 页）解释词义力求信实可靠，有理有据。具体办法是：遵守旧文，博问通人。就是遵循经籍群书对词义的表述，并广泛地向博通的专家请教如何确定词义。正如《说文·叙》所说：“遵守旧文而不穿凿”，“博采通

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徵，稽撰其说”，“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许慎遵守的旧文，有《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等经典，还有《司马法》、《春秋国语》、《逸论语》、《老子》、《墨子》、《史篇》、《师旷》、《尔雅》、《逸周书》、《孟子》、《甘氏星经》、《伊尹》、《春秋公羊传》、《楚辞》、《仪礼》、《韩非》、《吕不韦》、《传》、《方言》、《山海经》、《礼记》等群书（根据考证，以上书籍均成于周秦时期）。许慎博问的“通人”，共二十七家，有董仲舒、司马相如、京房、欧阳乔、桑钦、刘向、刘歆、爰礼、扬雄、宋弘、杜林、贾侍中（逵）、班固、傅毅、卫宏、徐巡、张林、王育、谭长、官溥、尹彤、黄颢、庄都、张彻、周盛、宁严、逵安，为汉代人。《说文》依据的经典、群书是对生动丰富的先秦词义的书面记载，而引用的“通人说”则是对生动丰富的先秦词义（也包括少量秦汉时代的词义）的口头记载。此外，许慎还考察方言俗语，以进一步收集、确定先秦词义的解释。有一部分先秦词义是流传、保留于方言和俗语之中的，方言俗语中的词义是先秦词义的分支或补充。

由于许慎有深厚坚实的文献基础，把整理先秦文献词义作为主要目标，整理先秦词义时态度严谨，因此《说文》在总体上忠实可靠地保存了先秦词义，精审独到地整理了先秦词义。

先秦时期的语言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说文》中也是单音词占绝大多数。根据考证与统计，《说文》9353文之中有单音词8834个。先秦经典文献中的单音词，就每本书来统计（不重

复),《论语》有 1513 个,《周易》1596 个,《周礼》1682 个,《孟子》1960 个,《尚书》1965 个,《诗经》2939 个。《春秋左传》虽为鸿篇巨制,也只收 4066 个,尚不及《说文》的一半。被誉为“训诂渊海”的《尔雅》,不过 3332 个,占《说文》三分之一多。

可见,就词汇量而言,《说文》大大超过任何一部先秦经典文献,《说文》包容了先秦文献足够的词汇量。

《说文》精审地总结了先秦文献词义,并且包容了先秦经典文献足够的词汇量,因此我们说,《说文》确实是先秦文献词义的集大成。